

瑞安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瑞安五黄先生·····	黄宗甄(1)
博闻强记 涵蕴众流·····	沈肇瑞(7)
——记林公铎的生平及其著作	
孙正容先生传略·····	袁剑峰(11)
先祖父兴学、育才、办实业的事迹·····	项榆荪(17)
忆郑剑西先生·····	上 青(19)
隆山塔诗句·····	薛纪芬(23)
薛钟斗年谱·····	俞天舒(24)
文史随笔二则·····	杨作雨(35)
由湖岭区杀委员事,回忆我的见知·····	林炜然(37)
瑞安国民党组织演变史·····	周兴杞(39)
浙南最古老的慈善机构·····	乐加楠 泮永钧(48)
——从育婴堂到福利院	
瑞安飞云阁楹联·····	何历生 俞大文(51)
王筱眉经营涂园种柑初见成效·····	许世铮(53)

瑞安五黄先生

· 黄宗甄 ·

瑞安五黄先生指的是黄体正、体立、体芳兄弟和体芳子绍箕、体立子绍第。但近代史资料有专就政治表现，称体芳、绍箕、绍第为三黄先生。而冒广生的《永嘉诗人祠堂丛刊》又就诗文写作，称绍箕、绍第为二黄先生。孙延钊则参合各方面，统称为五黄先生。

黄氏素以科名著称。正因为科名特盛，未免掩盖了学术、事业等方面。所以对当时人们关于科名说法的原形，不得不先交代一下：

体正应会试时，论成绩有列入会魁之望。只因科场事故列入副榜，但他任咸安宫教习时，仍然名动京师，实开黄氏风气之先。其余四人，先后都中进士，体芳还是会元。体芳父子和侄绍第殿试后，都入翰林。翰林乃清华显职，为世所重，且他们历主各省文衡，有“铅车半天下”的美誉。加之他们世居城镇小沙巷，该巷旧名振文坊，振文坊口有“比户书声”的匾额，以寒窗苦读而闻名。坊相当于现代的居民区。加之孙锵鸣住在邻巷大沙巷，孙衣言住在附近太平石，两孙年辈又长，也都是翰林。故当时瑞城东北一隅，同时住有翰林五人，而锵鸣科名早达，年又耆寿，入翰林后，甲子重逢，例得重宴琼林，有清一代不过数人而已，故对科名又并称孙、黄。直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绍第子曾铭以留学生毕业回国部试优等，称工科进士。次年殿试，选为庶吉士。虽被目为洋翰林，究还响起了一阵尾声。

但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强烈地反对科举，认为这是当时皇权，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巩固他们的统治，一无足取。因而对于先人的其它方面也予忽视，以致很少了解和研究。到了“四人帮”恐怖时期，由于自己也有些“左”的东西在作祟。想起了：绍第是我的祖父，体立是我曾祖，其余三人也都属近亲。当时觉得我的家庭出身，或是我进步的障碍，恨不得一口气把祖宗三代的事迹推得远远地，还希望飞云江的怒涛，把祖宗给我的包袱，冲得干干净净。

今日盛世修史。《瑞安文史资料》编者，为了丰富乡邦文献，景仰先贤懿行，一再来函，嘱我为祖辈写些史实或轶事，昭垂史册，只得勉力执笔。但祖辈所留存的蓂莪阁

藏书，以及有关案牍文卷，有的捐赠温州籀园图书馆，有的沦于抗战；有的沦于十年浩劫，劫余残编，寥寥无几。即是口头流传，亦以人事变迁，一传再传，打了折扣。我现在只得在依稀的回忆中，东麟西爪，仓卒疾书，难免有讹传谬误之处，希不吝指教！

“五黄”事迹，除《清史稿·列传》和公私档案外，散见于《清稗类钞》、《越缦堂日记》、《康有为日记》、《凌霄一士随笔》以及《孽海花》小说，时人奏稿、函札者甚伙。得暇检阅，当再作补充或校正。

据说昔日我族原住在东乡的岩里（大概在今日塘下区鲍田乡）称为“白岩黄氏”，那就是“鲍田黄”。只我们这一支住在城内。现将所知的“五黄”事迹，分述如下：

（一）黄体正（一八一〇至一八四九年）

字菊渔，生于清嘉庆十五年，二十五岁乡试时，中了举人第十五名。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入京参加会试，考卷很出色，主考官非常欣赏，互相推荐传观，传来传去，却把主要考卷丢失了，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一个进士“备考”。因此他就心灰意冷，不想再考了。便留京任咸安宫教习，为贵族王孙教学，他常以诗酒消遣。他善文工书法，性情豪放，平日不修边幅，在京长住，虽纳一位旗人女子为妾，但他离京时，可能由于当时禁止满汉通婚，旗人并未随他南归。黄体正是一位名士，对于诗文书法造诣很深。我在童年时，瑞安的许多寺院、庙宇、祠堂、牌坊、书院等公共场所，都有他所写的墨迹。他在一八四九年病故，仅得年四十，墓在瑞安东门外周湖山。

（二）黄体立（一八三〇至一八七五年）

字南乡，生于道光十年，二十二岁时与其三弟体芳（二十岁）同时参加浙江乡试，考取第六名，当时在十名以内都被称为亚元。二十七岁时考取进士，殿试为二甲第六十二名（同科中第一名为翁同和）被点为刑部主事。他平时喜欢填词赋诗，选辑过唐宋名家词。又与山阴李莼客（慈铭）编辑诗集。一八六八年，三十九岁时与其三弟体芳同住在北京达子营官邸。一八七〇年，母吴太夫人卒于瑞安，他兄弟俩丁忧回故乡居丧。一八七二年服满又北上。一八七五年，四十六岁时，卒于京师。墓在瑞安仙岩白云寺山。

我在少年时代，曾搜集到一张典赁房屋的字据，那是曾祖父黄体立所写的。他的堂兄弟把屋典给别人，黄体立为作中间人，可见当时黄家仍是贫穷的。

(三) 黄体芳(一八三二至一八九九年)

字漱兰，生于道光十二年，二十岁时，便与他的二哥同时参加乡试，中第八十九名举人。三十二岁时，北上应试，中了是科第一名会元，殿试得二甲第十名进士（同科张之洞为一甲第三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瑞安县特拨制钱七十串（每串千文），作为他中会元的贺礼。当年冬，黄体芳乞假归省，以梨园觴客，当场写了对联“敢为科名矜梓里，聊凭弦管替莱衣”。盖兼为其母吴太夫人七十五岁庆寿。东郊丰湖修禊祭祀，他又作联：“笙歌共醉丰湖月，觴咏如传曲水风。”这两副对联传为美谈。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散馆以一等第一名（张之洞为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一八六八年擢升翰林院侍讲。一八六九年奉命视学福建。一八七〇年，吴太夫人逝世，丁忧还乡。一八七二年服满北上。除服之日，集句作联曰：“日月有时，昊天罔极！”。以后，他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他直言勇于上谏。当时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等称为四谏。凡遇有大事，必上疏痛陈是非，被称为清流派，他为首脑，除以上四人以外，还有其子黄绍箕与其侄黄绍第等多人。上疏弹劾，不避权贵，反对在外交上丧权辱国，以及在內政上腐化堕落。每上一疏，必震动朝廷。他曾弹劾过清廷办理外交事务的崇厚，参奏他出使俄国，对中俄伊犁问题，割地丧权。记得我在少年就读于瑞安初中时，历史教科书中曾提及黄体芳参劾崇厚割让新疆伊犁大片领土的史料。

一八八五年，他冒险上奏折，弹劾李鸿章治兵二十余年，毫无建树。奏章递至朝廷后，慈禧太后正在掌权，李鸿章是她的亲信，加之折内还具体提出：请以曾纪泽接替，侵犯了皇家用人大权。“老佛爷”在震怒之下，批示：“该侍郎迹近乱政，着即拿问。”但他究是铮铮谏臣，素孚众望，结果只降了二级调用，改任通政使。他既然冲击了掌大权的李鸿章，不可能再在京城工作了，不久便“乞骸”退职了。此事《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清实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洋务档》均有记载。一九四九年夏天，上海解放后，我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时，在故宫大殿陈列室中，当时为说明清廷的腐败昏愤，曾把黄体芳的重要奏章，陈列展览。

一八九一年，黄体芳六十寿辰，翁同和赠以联云：“抗疏不矜，乞骸非隐；传经多寿，命酒长生！”一八九五年，他被迫到南京（江宁），先掌教于江宁，后又创办南菁书院于江阴。为书院撰联云：“东林讲学以来，必有名世；南方豪杰之士，于兹为群。”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他痛感国事日非，清廷腐败，亟思改革。他与子绍箕、侄绍第一起参加上海强学会。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又遭失败，他痛心疾首，悲愤不已，乃归故乡，于第二年（一八九九年）逝世，得年六十八岁，安葬于瑞安的二十四都前坪斤竹山。

黄体芳的遗作，分别选录在平阳黄群（溯初）编纂的《敬乡楼丛书》与冒广生编选的《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另外还著有《醉乡琐记》。

（四）黄绍箕（一八五四至一九〇八年）

字仲弢，号铎庵。生于咸丰四年，十七岁时县试得冠军。二十五岁参加乡试中举人第十五名，开始随张之洞学习，讲求经世致用，注意古今学术流派，中外学术的变迁，潜思精究，知识广传。后来也成为张之洞的侄婿。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参加会试，殿试得二甲第六名进士，朝考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升侍讲。他参加黄体芳、张之洞、张佩纶等所组织的清流派，曾与其堂弟绍第对改革国事一再共同上疏，且奏请阻止与日本议和，又上书参奏海军败迹，痛论割地赔偿之害。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初到北京，第一次向清廷上书，便得到他的支持。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光绪十四年……游京师，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实左右其事”。

一八九五年，黄绍箕到湖北武昌，为乡试主考。据《清稗类钞》记载：“瑞安黄仲弢提学绍箕初以湖北主考陛辞请训，德宗（光绪）论之曰：“现在百姓困苦已极，皆朕不德所致，然卿辈亦不能辞咎。朝政非更张不可，卿此去极宜留意抡才，为我得可用之人。”

在此同时，他的堂弟黄绍第被命为江苏主考，昆仲同时出京。黄绍箕在武昌事毕返京前，先到江宁，探望其父黄体芳与堂弟黄绍第。这时康有为已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与黄绍箕等讨论强学会章程，然后在上海刻印。章程中首先提出：“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不讲，故政治不举。今日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黄绍箕与其父体芳、堂弟绍第一起入会。一八九七年黄绍箕、绍第又加入务农会，并在瑞安组织务农支会。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京师大学堂建立后，黄绍箕首任总办。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北京景山东街参观北京大学时，看到“京师大学堂”的红漆金字的长方旧校牌。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写的“劝学篇”，系由黄绍箕递上朝廷。慈禧搞政变，风声日紧，政变前夕，黄绍箕通知康有为逃走，故未落入虎口。《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至夕出城，而见南海馆屋室墙倾覆，心窃怪矣。黄仲弢钱我，戒以事变作，荣禄将谋害我，劝易装出山东，勿经天津。……无仲弢之言，宿天津必死。从仲弢之言，出烟台亦必死。”一八九九年因其父病逝，回瑞安奔丧。返京后继续办理京师大学堂。他又曾主办译学馆、编书局，又曾赴日本考察教育。他去日本之前，遣派其长子曾延（兰孙），入东京庆应大学学习理财，次子曾铭（厚卿）亦赴日留学。黄绍第遣派次子曾锺（端卿，

我的父亲)入东京一桥高等商业学校,三子曾铭(述西即宗江、宗淮、宗英、宗洛、宗汉的父亲)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电工,黄绍箕回北京以后,研究中国历代的教育制度与方法,作出革新的建议。有人指出,当时“学务萌芽,科举未废,士大夫或茫昧莫知其原,绍箕本中国教法,参考东西洋学制,手订管理教授规则,是为中国有学堂之始。”

“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提倡之力。”(伍铨萃《国史儒林传·黄绍箕传》)。

他对地方教育非常关心。一八九六年由孙诒让牵头,与从弟绍第等发起创办《瑞安学计馆》。一八九七年瑞安又创办《瑞安方言馆》。一九〇二年合并为《瑞安普通学堂》,黄绍箕、绍第在外,遥领为总理、副总理之职,实际上是由孙诒让负责的。他对地方青年非常爱护,除派青年往日本留学外,还推荐平阳王志澄(理孚)、瑞安林同庄(大同)考入上海南洋大学。还介绍王志澄拜访严复(几道)。

一九〇六年,他又到武昌任湖北提学使。一九〇八年病逝于任上。不仅湖北学界人士闻耗,送殡者多达数千人,他省亦有停课志哀者。黄氏在国外亦享有盛名。日本学界推尊为“仲尼后一人”,帝国教育会曾颁赠“颂状”与“奖牌”以及表彰。

黄绍箕一生从政,终身好学,覃思精研,造诣湛深。著《中国教育史》五卷,由后人排印出版。撰成《汉书艺文志辑略》,续吴大征《说文古籀补》举正讹误十四条,为孙诒让《墨子闲诂》详校,订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舛误十余则。陈石遗《近代诗钞》采入他的诗多首。陶湘选印的《昭代名人尺牋》(续集)收录他的信札。后人编辑并刊行《鲜庵遗文》(惜砚楼丛刊本)、《鲜庵遗稿》(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本)、《二黄先生集》(墨香笈丛编本)等。

他墓葬于瑞安二十四都盖竹山。

(五) 黄绍第(一八五五至一九一四年)

字叔颂,号绶庵,是我的祖父。生于咸丰五年。受业于黄岩王葵(子庄),那时王长永嘉中山书院。一八七二年县试得冠军,一八七九年选浙江优贡第五名。那时,他对于国事忧心忡忡,颇感失望,无意仕进,终日吟咏山水为乐。后受到黄绍箕的影响,才又决心勤学科举的书籍,一八九〇年会试考取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八九五年,他从北京到江宁主持乡试,与绍箕昆仲同时出发为两省主考,被传为佳话。在京时与黄绍箕同时参加清流派。一八九五年又与叔父黄体芳、堂兄黄绍箕同时加入强学会。他返京后尝与黄绍箕联名上疏,痛陈外事丧权,建议改革。一八九八年戊戌改革时间,他于九月十四日单独上书,建议从义务教育、工业、商业、妇女四个方面,提请“设法变通”,整顿义塾,提倡普及教育;广兴工艺,提倡设工厂,以收贫民;劝兴妇学,以敦

风化，仿泰西之俗，应男女平等，必须禁止妇女裹足，应将中国二万万妇女的残疾，一举而廓清之。变法失败后，他去湖北。他同情革命，爱护青年，他与黄绍箕曾保护和营救过当时的革命党人，如张难先、吕苾筹、李书城等人。吕苾筹曾任国民党浙江省省府民政厅长，到瑞安视察时，特别访问我家。张难先在解放后曾有信寄给我们的堂兄黄汀秋，历述当时被掩护的经过。

辛亥革命后，黄绍第回乡隐居。北洋政府曾电召去北京。但他在戊戌政变中，看透了袁世凯，置之不理。他于一九一四年病逝于家，享年六十岁，安葬于瑞安东区仙岩白云寺山谷。

张之洞与黄绍箕的关系很深，与黄绍第也相当好。张之洞的夫人深知黄家很穷，要张之洞给黄氏昆仲设法找个好差司，后来选了武昌盐法道，行署设在宜昌，即所谓宜昌盐道。当时黄绍箕正担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又要赴日本考察，乃让黄绍第担任盐道，尝来往于宜昌与武昌间，所以接触一些革命党人。他们被捕后，曾暗地赴狱探视。

我曾听曾铭（述西）三叔说：年轻时，家里缺粮，因我父已与飞云江南岸屿门村孙家订婚，孙系大地主，议给随嫁田一百亩，在未结婚前，即办理田亩过户手续，以济眉急，可见翰林地位华崇而生活却很清贫的。

我看见《人民日报》一月八日我姑丈冒鹤亭的儿子冒舒湮发表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十周年的文章，谈到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冒姑丈住在舒湮家时，总理因与冒有世交之谊，冒又是当代诗词名家，毛主席也很赞赏他的作品，所以总理也代表毛主席致意。舒湮提到鹤亭姑丈刻过《二黄先生集》，总理便询及冒家与晚清著名人士黄绍箕（即鲜庵）、黄绍第（即纓庵）昆仲的关系，才知道黄绍第是冒鹤亭的岳父，也了解到，宗江、宗英与冒舒湮的亲缘。

黄绍第的重要著作有《瑞安百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他回乡以后，曾出资重修飞云阁。

以上的芜杂零乱之文，虽然陈述了“五黄先生”的生平事迹，但实际上作出较多贡献的，还是三黄——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在政治、教育思想方面，他们还是逐步跟上时代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究竟受到多方的束缚。当时他们仅逐步认识到清廷统治已走向没落，八旗子弟已成游手好闲之辈。三黄先生等虽看到清末统治的流弊，痛感有振兴中华之必要，但仅赞成“经世致用”、“富国强兵”、“发展科学”。黄绍第最后甚至同情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可是他尚未跳出封建纲常的社会风尚和道德实践，依然徘徊在封建轨道之上，而且束缚在儒家经典之中。就是说中国近代的大门是由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的。这个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到现在，还是盘根错节，纠缠不清，这需要努力改革，以求实实在在地做到有“科学”与有“民主”日子的到来。

本文承王超六同志认真增订，林炜然老师等审核，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现任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审)

黄体芳·仙岩陈止垒词联：

富贵总浮云，何如一代文章，留与名山作副；

沧桑经劫火，遥看千年俎豆，仍依古佛为邻。

博 闻 强 记 涵 蕴 众 流

——记林公铎生平及其著作

· 沈 肇 瑞 ·

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温州不少仁人志士深慨外患侵袭，国难迫邇，或投身于维新运动，鼓吹变法，或吕明学术，援古讽今。如陈介石（黻宸）是当时的著名代表人物，与陈虬、宋平子有温州三杰之誉。林公铎系陈介石的外甥，从小长于舅氏之门，耳濡目染，其治学途径如出一辙，尤以标榜永嘉学派为己任。《中国近代学人像传》、《瑞安县志》、《两浙人物简志》都为林公铎列入传略，其弟子徐英还为他写了《林公铎先生学记》一书。他卒后，当时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举行公葬，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为墓志书丹勒石。

林公铎（一八九〇至一九四〇），名损，又字功读，瑞安城关人。当他刚出生时母亲便去世，由舅父陈介石交其妹即林的姨母抚养，从此林公铎对他们感同再造之恩，恭敬逾恒。他幼时款悟绝伦，姨母便悉心教他读书，“教之一字，命反三隅”、“师爱殊深”（注一）。七岁时，他的父亲又不幸亡故了，便成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与舅父形影不离，侍学左右。稍长，益博览群书，致力愤典，探颐索隐、学业大进。陈介石的言行，对林公铎的影响是很深的。一九〇七年，陈介石以名进士应两广总督岑春煊的礼聘，赴广州主讲两广方言学堂，因率高第弟子讲学羊城，这时林公铎年方十八岁，与他的表兄陈孟冲（名怀，陈介石之侄）一道到了广州。林公铎以少年老成博闻强记周旋其间，每发表言论、文章，独具卓识，藻思恢阔，倾惊侪辈，长者交口誉云，为不久进入北大执教树立了先声。据说林公铎当时在粤，慨于清末政治腐败，“悲如贾生，狂拟同甫”，草过万言书，由于某些原因“书阻未出”（注二）其内容也不得而知了。

一九一三年，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聘林公铎为文学教授，他只有二十四岁的青年，居然能跃进最高学府的讲坛，这是由于陈介石的提携和他自己刻苦努力取得渊博学识分

不开的。他与舅氏联翩执教北大，一时传为佳话。陈介石覃精诸子之学，在北大担任的也是这一门课程，一九一七年陈氏卒后，所遗课程，一时无适当人选接任，北大当局以林公铎是陈氏的嫡传弟子，且来校授课已经四年，便将诸子课程由他继续执教，循循善诱，酷肖舅氏，获得了好评。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林公铎离开了北大，去沈阳东北大学执教一年，第二年因皇姑屯事件发生，又离开东北返回江南，重游了相隔二十年的羊城，一九二九年又回到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初期，北大改组，标榜革新，校中一些旧派的老儒教授，相继离校，但林公铎仍以国粹派自居，继续留校，坚守旧文学的阵地，新派和旧派之间，互相攻讦，他性格倔强，新派对他莫如云何，结果由于新派的排斥，他于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也离校了。同年秋天，他应黄侃（季刚）之约，到中央大学执教，一九三六年应聘主西北某大学讲席，一九三七年返回瑞安度假，适七七事变发生，烽火连天，兵戈阻途，便里居不出，日以整理旧稿赋诗、饮酒自娱，一九四〇年以疾卒于家，年五十一。

林公铎一生，除了上述执教各大学外，还担任过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交通大学教授，而在北大最久，先后达二十多年，春风化雨，乐育了不少英才。

北京为全国人文荟萃的地方，而北大尤汇聚了硕学通儒，如黄节（晦闻）、黄侃、刘师培（申叔）、刘毓盘（子庚）、吴梅（瞿安）、张尔田（孟劬）和陈汉章（伯弢）等都以绝诣称于时。林公铎以他的文章渊博、名理粲然相与往还，交情甚笃，他们年纪与林公铎不相上下，惟陈汉章、张尔田岁数较大，也作为忘年之交。他们之中有的治学途径与林公铎是异趣的，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如吴梅是词曲专家，海内奉为圭臬，赠林公铎诗有“四库罗胸君不贫”“万古文章要独肩”之句，推崇备至。黄侃精研小学，擅长考据，他与林公铎交游深如温雪，复申以姻娅之谊，以他的甥女妻林公铎之侄林尹，林有诗云：“永好缔婚媾，深衷素所许”盖纪实也。黄节是清末畸人，林、黄两人很早就订交羊城，并先后在北大同事十余年，林有《晦闻招饮四席作》诗“刎颈深交得魏其”之句，可见交情之深。林公铎的至契学侣要数陈孟冲和马叙伦两人，他们同时游学陈介石之门，孟冲少颖异、宋平子誉以“学提百氏要，识破千龄迷”，曾随陈介石在粤讲学时为作讲义笔录，并参与陈氏创办的《世界学报》撰稿，孟冲长林十岁，两人情犹骨肉，谊兼师友，正如林公铎自己所说的“盖自先舅崩殂，梁木已坏，孟师戾止，斤斧稍加，如是两人，对影成四，师唱弟和，数惊里耳”（注四）马叙伦（夷初）是当代的著名的民主人士、训诂学家，是陈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氏卒时，马亲自来瑞吊奠，其祭文云：“三千之中，视我犹子，事父未能，亦吐肺腑，……今也何如，浩浩江水一勺之水，师实享之，一掬之诚，师实鉴之，海天万里，惟魂共云”。亲切之情，溢于言表。他与林公铎系少年同窗，后又在北大共事十余年，晨夕相处，交谊逾于常人。

“五四”运动中，林公铎正在北大任教，在文学革命的领域里，他作为守旧的国故

派站在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一边，他是标举传统文学旗帜反对新文学的。他虽以为学无所谓新旧，，捐新旧之争，唯其是而已，曾与陈孟冲、黄离明创办过《唯是学报》，但实际认为旧文学一切都是好的。尔后，他与胡适派在新旧文学斗争中，论战不休，他直斥胡适派以俚语（白话文）代文章（文言文）。据说有一次他对胡适说：“你说文言文不好，那末你字‘适之’的‘之’字也是文言，那怎么解释呢？”胡适窘而含笑不答。一九二一年，林公铎挡不住北大新派的洪流，他被辞退了。他大写抗议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致胡适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意思是说还没有完全剥夺我向你进攻的“武器”，这事不久也平息了。后来他做了一首诗嘲胡适：“我头无笠况乘车，君毅丹朱赫有余”意思是说我没有头街还可以乘车，不过你的车装饰得显赫而已。

林公铎和黄侃的怪僻是人所周知的，林也承认“我有奇癖，气压朋侪”，不过他比黄侃还容接近得多。他孤芳自赏，目空余子，不阿权贵，不善逢迎。一九三二年他在交通大学执教时，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孙科以兼任校长身份来到上海，写了一张召集训话的传递通知单，通知各教授参加，他看了非常恼火，在通知单上写了“知道了！”和“我不训汝，汝训我何”几个字。“知道了，钦此”是清朝皇帝从列祖列宗相沿下来的朱批，这可侮渎了孙科的“尊严”，传递人连忙改写一张通知单，此事使人惊诧不已。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谈到林公铎的“态度也是很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这话是很中肯的。

林公铎与饮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嗜酒如命，已经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竟日手持酒杯不释，与人交谈，边饮酒边议论，出口成章，“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不绝于耳。在讲坛上遇到争议时，亦持酒杯去讨论，口若悬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解者以狂狷目之。林公铎平时脸孔总是红红的，年未五十即老态龙钟，衰态毕露，这与饮酒有很大关系。

文人一般都欢喜藏书，林公铎购置图书与鉴赏家不同。他是为了用书而藏书，而不是搜罗珍本秘笈作为鉴赏。他需要什么书就购什么，在他的书斋里尽是扫叶山房一类的石印本或其他排印本。收藏内容也是异常丰富的，上至经史子集下至小说笔记都有配套收藏。笔者还曾发现林公铎在小说笔记上也作过批注，可见他涉猎之广了。他为文思路敏捷，援笔立就，这与博览群书分不开的。

在新旧文学领域的斗争中，林公铎虽曾说：“白话之当提倡与否，是所不论也，然要不能屏之于文之外，则以无可疑者”（注五）他只是承认白话文是文章中的一种体裁，实际上反对新文学的。但他在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却有一定的贡献。林公铎生长东瓯，其学术以舅氏陈介石为依归，平生覃研经史，兼综诸子百家，对永嘉学派义董、陈（止斋）叶（水心）的经济致用学术思想，尤有所阐扬。他不喜考证训诂之学，以为支离破碎，无裨事功，故独善辞章，，籍以穷本溯源，发挥微言大义。其文章博奥雄辩，

不落流俗窠臼。诗也写得很工，介于神韵、性灵之间，寓名理于吟咏，格调高古，回异时流。

林公铎自二十岁开始著述不辍，其遗著经弟子姜绍谟、黄建中编记者达四十余种。一九三三年，他曾将著作拟汇为《叔苴阁丛书》，并写过提要总序，他既谦虚又自负的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少为师友所叹，长蒙流俗之讥，轨物从游，挥斥众体，此在予为易，亦钟学所却步也”。他著作虽多，已刊者甚少，但大都尚未刊行，零篇断简散见于学报、杂志而已。兹就史料所见，将其遗著按年代略加诠次：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〇年

（1）《政理古微》，二十四岁作，有刊本。此为政治思想专书，分政始、述古、制法、爱民、养性、劝学、尊隐、尚俭、重农、综合十章。林公铎因目睹袁世凯称帝，国事日非，民生凋疲，为反对盲目崇洋，爰稽往古之训，发扬永嘉学派的事功精神。

（2）《伦理正名论》，二十余岁作。有刊本。此书立论甚异，认为“世无哲学，所谓哲学者，皆伦理也”。以正伦理之名。

（3）《永嘉学派通论》，亦名《永嘉学派述》，二十余岁作，曾刊载《瓊风杂志》及其他学报。其内容系论述永嘉学派之本源，认为“永嘉诸子之言事功必不能离心性”“体用兼顾，合心性事功归极于经济”。一代词宗夏瞿禅以“公铎论永嘉学一篇谓无心性是不为经济甚好。”（天风阁学词日记）

（4）《中庸通义》，二十余岁作，仅存第一章，曾载北大哲学月刊。通论中庸之义，阐明儒家所谓性可以主宰万物，以为中庸之道，乃用性之当，“中庸者，明性之利器也”，然后适性可致修齐治平之功。

（5）《中国文学讲授发端》，讲义抄本。林公铎二十四岁被聘为北大文学教授，此讲义当作于是时或稍后一年。内容分十二纲（子）文之定义（丑）文词与文字（寅）文词之定义（卯）文词与文字之界统（辰）研究文学之范围（巳）学文之标鹄（午）选文举例及其标鹄（未）讲授规则（附谈辨准绳）（申）答问规则（酉）正名规则（戌）征典规则（亥）缀文规则。

（6）《文学要略》。仅存拟目。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〇年

（1）《人生与宇宙》，三十七岁前作，弟子笔记纲要本，曾载北大哲学月刊。

（2）《诚与自由》，同上。

（3）《老子口义》，三十八岁作，讲义本。依弟子听讲之笔录整理补充而成，内容分七辑，推理阐述周详。卷首附《老子读法》。

（4）《老子集语》、《老子微》、《黄老辨》、《老子纬》、未刊，均三十八岁作。

下列著作已刊者极少，大都未刊，其撰述年代未详，或仅有存目

- (1) 《中国文学论著辑要》，抄本。
- (2) 《叔苴阁诗录》，已刊一部分。
- (3) 《叔苴阁文录》，已刊一部分。
- (4) 《洪范衍义》、《大学衍义》、《礼运衍义》、《政党论》、《政教分合论》、《辨教》、《周秦诸子述》。
- (5) 《庄子微》，未刊。
- (6) 《吴尹子发微》，未刊。
- (7) 《列子微》，未刊。
- (8) 《稽式论》、《唯心论》、《破执论》、《伦理三途辨》、《玄学》、《非名录》、《畜德录》。
- (9) 《考据学商兑》、《注疏义例》、《瓯音变迁略论》、《瓯谣订正》，已知以上四书仅存其目。
- (10) 《文学探源》、《明诗》、《修辞七论》、《文学破邪论》、《文诂》、《明思》。

注一、林公铎：《索几庐师友录自序》

注二、同上

注三、林公铎：《索几庐师友录自序》

注四、林公铎：《中国文学讲授发端》

(孙)(正)(容)(先)(生)(传)(略)

· 龚 剑 锋 ·

孙正容先生(一九〇八至一九八五年)，字端廌，谱名庆加，曾名济川，晚号乔叟，读雪轩后人，正容为其学名。浙江省瑞安县人。解放前，他历任国立浙江大学讲师，中正大学副教授，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师范学院教授。解放后，他主要担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历史学会顾问。他是我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浙江省史学界的老前辈，精于中国历史研究和古文献整理，且擅长诗词书法。他为人正

直，治学严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五年，桃李满园，著作等身。我有幸受业于先生门下，且担任先生晚年之助手，师生之谊，情犹父子。今略述先生之生平、业绩，是为先生小传。

(一)

孙正容先生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五日）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县孙桥乡孙桥村。父亲孙毓英，号默庐。母亲沈氏，继母袁氏。兄弟姐妹五人，先生居长。其弟正丰，现为海外某大学教授。先生少时，天资颖异，聪慧过人。总角束发，即以诗童名于乡邦。一九二〇年八月至一九二三年七月，先生前后就读初小于孙桥小学，就读高小于瑞安县立小学。瑞安为文化之乡，曾有“东南邹鲁”之称。晚清学者，孙衣言、诒让父子在瑞安县城建有藏书楼曰“玉海楼”，“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孙衣言《玉海楼藏书记》）。孙正容先生在县小读书时，当孙诒让先生谢世不久，他仰慕乡邦先贤之成就，少年立志于玉海楼前。一九二三年八月，先生以优异成绩考进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问学于朱自清等先生。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中毕业。在回家途中写下了《飞云晚渡》一诗，其词云：“云江淼淼浪长流，游子归心系小舟。落日孤帆城外渡，余霞一片望中收。沙鸥戏水浮边浦，塞雁横秋拂戍楼。遥见家乡残塔在，茫茫兵气暗神洲。”末句是写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

先生初中毕业后，未读高中。同年八月，他借族叔孙济川之高中毕业文凭，考进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一九二八年改名中央大学）史学系，受业于柳诒征、陈汉章、雷海宗、汪辟疆、王澐、吴梅、黄侃、王易、张其昀、陈训慈诸公门下。他博览群书，发愤攻读，所从诸师，皆海内名家，一时俊彦。他如鱼得水，颇有所获。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在《中央大学半月刊》（一卷十三期）上发表了《三皇五帝传说由来之蠡测》一文。同年，又在杭州《民国日报·来论》上发表了《袁崇焕死难三百周年纪念》一文。另外，有一篇关于蒙古史的论文也在校时发表于《中央大学半月刊》，一九三一年一月，他修满学分，提前半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央大学史学系爱先生之才，欲留他做助教。但因工资较低，又身为长子，有照顾家庭之责，故只好婉言辞谢校方的好意，他离开南京，回到故乡浙江。

(二)

一九三一年二月至七月，先生被杭州市立中学聘为历史教师。同年八月至一九三三

年七月，受聘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今绍兴一中）任历史教师。他在五中任教期间，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他义愤填膺，写下了《九·一八志愤》等诗文。他还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参加游行示威，发表演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捐献一个月工资，以作抗日军费。他在宣传抗日爱国的同时，还悉心育人，诲人不倦，学生成绩之优异，冠于浙江全省各校。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七月，先生应聘担任被誉为全国四大名牌中学之一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今杭州一中）的历史教师。在杭高期间，他在杭州《民国日报·来论》、《东南日报·云涛》、《越风》、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社论等杂文，继续宣传爱国抗日。其中《民族精神之在西湖》一文（原刊于杭高校刊《明远》），在杭州《民国日报》上整整连载了一个星期。此文以埋葬于西湖边的岳飞、于谦、张煌言等爱国将领的事迹为例，宣传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文章发表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针对杭州的部分知识分子醉心于西湖山水，缺乏刻苦钻研之精神，便在杭州《民国日报·来论》上发表了《论杭州之学术风气》一文。他在文中强调科学研究需要刻苦精神，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研究民族文化，使杭州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他先后在《文澜学报》（第一集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南宋临安都市生活考》、《清咸同间购轮换轮事件始末记》两文；又在《图书展望》（第一卷第四期、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唐虞让国之社会学解释》、《本国史时期划分的研究》两文。其中《南宋临安都市生活考》一文，从位置、人口、食货、市政、街坊、教育、娱乐、风俗、宫廷等九个方面对南宋临安城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堪称宋史研究之大作。一九三七年前后，他还编著了《高中新本国史》（全三册）一书，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书版次多达十几版，成为三、四十年代最受欢迎，最畅销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一。

一九三八年，杭州沦陷后，先生随杭高内迁到丽水碧湖。当时，杭高与杭初、杭师、杭女中、湖中、嘉中、民众实验学校等省立七校联合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先生任临中历史教师。不久，临中又分为联高、联初、联师三校。一九三八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先生在联高任历史教师。一九四〇年二月至七月，又任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讲师，他讲课生动，内容扎实，深受学生欢迎。在浙大时，他还编著了《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组织》一书，可惜书稿已毁于十年动乱之时。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先生仍任联高历史教师。一九四一年八月至一九四二年十月，担任浙江省立临中第三部主任、浙东第一临中校长。战时临中学生大多是来自沦陷区的流亡青年。身为校长孙正容先生与师生同生死、共存亡。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日寇流窜金华、衢州，位于常山的临中第三部奉令疏散，先生在紧急动员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凡是无法自行疏散的学生，我孙正容一定与之同生死，共存亡，决不弃之不顾”。当时学生感动

得流下了眼泪。先生还对学生施以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中华民族之不屈精神，鼓励学生
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炼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生中有的参加了新四军，奔赴抗
战前线；有的考上名牌大学，现已成为学者专家。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先生率领师
生，出入于烽火之中，辗转于浙南、浙西的崇山峻岭，在十分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致
力于提高民族文化的事业，令人敬佩至极。

(三)

一九四三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先生受国立中正大学（时迁江西泰和）校长、
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先生之聘，就任该校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时年三十五岁。当时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后期，先生深信胜利在即。他曾在中正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发表
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和谈地点问题的演说。他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
英、法、美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国家，中国可以在国际和平事业
中起桥梁作用，因此战后和谈最适宜的地点应是中国。演讲稿刊登在当时的《中正大学
校刊》。

一九四四年冬，日寇侵占泰和，先生避难到宁都。一九四五年二月，先生应国立暨
南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先生之聘，赴福建建阳就任该校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不久他又被提升为教授。暨南大学誉冠东南，与先生共事者，多为海内名家。

一九四六年八月，先生离开暨南大学，赴浙江金华受聘担任国立英士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教授。一九四八年八月，先生又被国立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但时值解放战争之际，
又因交通阻塞未能赴任。此后，先生应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及瑞
安中学之邀，曾去三校作短期讲学。一九四九年八月先生又应家乡瑞安中学之盛情邀
请，担任该校历史教师。校方对他关怀备至，极为重视。解放初被邀请去东北大学任
教。当时正患病吐血卧床，不便远行，去信婉言谢绝。先生在瑞安中学任教期间，颇受
学生爱戴，师生情谊甚深。他还担任政协瑞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来在金华参加中
国民主同盟并担任金华市政协委员。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始终如一。

(四)

一九五六年八月，先生被请到新创办的杭州师范专科学校（浙江师范大学前身）历
史科任教。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九五七年，先生撰写了《有关中国近
代史分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应注意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
会形态，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变化这一线索，主张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一八

四〇年至一八六四年），形成（一八六四年至一九〇一年），加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动摇（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四个时期。此文发表于《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精辟，颇有独到之处。一九六一年，杭州师范学院（一九五八年由杭州师专发展而成）历史系划给杭州大学，当时先生正患病在象山疗养院休养治疗，故返校后便留在杭州师院中文系，讲授《中国通史》。一九六三年，先生完成了用新材料新观点编写的近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可惜书稿除“先秦部分”尚存外，其余皆毁于“十年浩劫”。先生在《杨园小歌》诗中所言的“著书百卷尽成灰，白骨一堆葬青史。每念及此不自安，长啸一声中宵起！”即指此事。同年，他还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三万五千字的《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的长篇论文。文中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写作的时代背景，《史记》的形式、内容，《史记》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及《史记》的补窜，注释和版本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功力颇深。

一九六五年七月，浙江师范学院（一九六二年由杭州师范学院、浙江体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合并）由杭州迁至金华，先生也随校来金。“十年动乱”之时，他经受了严峻考验，坚持了崇高的气节。面对林彪、“四人帮”摧残师范教育事业，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九七〇年，当全省唯一所存的高师——浙江师院被强令撤销时，先生拂袖而去，以退休表示抗议。至此，先生已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退休后，他寓居于杭州市湖滨六弄五号。

（五）

粉碎“四人帮”后，先生心情为之振奋。他于一九七八年重新返回浙江师院作了短期讲学，并着手开始著书立说。此年，浙江省历史学会恢复活动。他当选为理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精神更加焕发。一九七九年，他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元明之际史料校核举例》一文。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注释》一稿，也由学校铅印出版。一九八〇年一月，年逾古稀的孙正容先生正式复职。一九八一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恢复他的教授职称。担任历史系主任。先生作诗云：“十年垂倦羽，今返旧巢居。野树参差合，山花烂漫舒。楼台迎旭日，几案列图书。晚景情怀迫，流光度莫虚。”先生心情舒畅，老当益壮，把晚年的心血和精力都化在多卷本明史著作《新明纪》的编写上。

《新明纪》一书，计划写二百万字。体裁为编年体，同时兼收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全书分“明前”（前编）、“明”（正编）、“遗明”（后编）、“附录”（图表）等四大编。正编又分“盛明”（洪武至宣德）、“中明”（正统到隆庆）、“晚明”

《万历至崇祯》三大部。每部又分若干册。每册又有“正文”、“注文”、“按语”三部分组成。全部规模宏大，被列为浙江省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新明纪》第一册《朱元璋系年要录》三十八万字，已于一九八三年三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受学术界重视，《中国出版年鉴》（一九八四年）刊有评介专文，称其特色为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翔实可信。此书又获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第二册《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录》生前已完成建文、永乐两朝，约二十多万字。事业未竟，人已作古，实史学界之一大损失。

先生晚年兼任浙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他与人合作的校点《鸿猷录》一书，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历史知识》等刊物，发表了《新明纪选刊》、《略论朱元璋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明通鉴标点失误举例》、《从建文逊国说看旧史家的局限》、《建文纪年》、《司马迁的爱憎》、《清难之役》、《略谈〈史记〉的形式》、《建文元年要录》，这些文章或研精钩深，补苴罅漏，或攻错指谬，力创新说，或显隐阐幽，独照隅隙。不因袭陈言，自出机杼，立一家之言，不好丹非录，行文明晰，且言之有物。这对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来说，在短期内，能出如此众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是难能可贵。一九八三年，先生作为浙江省代表，赴北京出席了“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历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又被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顾问。

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和书法家，张慕瑾先生称之“才识学三长，史笔如云今有几；诗书文兼善，多能艺事足千秋。”先生担任“西湖诗社”理事，诗风浅白平实而意蕴深邃，词风兼婉约豪放之长。今存有《烬余忆零集》、《更苏集》二部诗词稿。

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教学过程中，具有很高的讲课艺术。他以科学的观点，严密的逻辑，丰富的材料，生动的语言授课，有口皆碑，深受欢迎。桃李芬芳，学生中有的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

他晚年虽体弱多病。但他总是以“岁月不饶人，勤奋可补功”自励。无论是节日假期，还是严寒酷暑，他每天都是分秒必争地伏案著作，长期伏案，积劳成疾。八四年底，他的右眼突然失明一个星期，并且患了直肠癌，仍坚持工作。组织上要他尽早赴杭治疗，但他一定要等历史系地方志进修班开学，让他讲完课后再去住院。他说方志班是挂了他的名的，他要对学员守信用，负责任。于是他等到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方志班开学，他给学员讲了整整一上午课后，才放心地在当天下午乘火车赴杭住医院。这是他在讲坛上度过最后一天。在住院期间，他仍坚持在病房中学习、工作。就是在逝世前一个星期，他还要笔者给他寄方格稿纸，要进行《新明纪》第二册的最后定稿工作。

孙先生因患癌疾又脑溢血，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在杭州病逝，终年七十七岁。